

结构制约与个人特质：向上婚能扩大凤凰男的社会资本么？¹

芦强 雷鸣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摘要：基于阶层结构形成的交往机会与基于个人特质形成的交往偏好是影响社会网络建构的两个因素。对于那些阶层位置发生变化的人而言，尤其是对于那些由底层走向上层并与上层实现阶层融合的人而言，个人特质是否仍然能够对他们构建社会网络发挥作用呢？我们选择凤凰男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他们的向上婚是否会扩大他们的社会资本。通过对向上婚以及非向上婚的凤凰男进行倾向值匹配，控制掉这两类人群在诸多社会特征上的差异，回归结果发现，这两类人群在拓展自身交往范围以及提高自身网络影响力方面均不存在差异。这说明即使阶层位置发生变动，个人特质依然对社会资本的建构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结构制约，个人特质，倾向值匹配，向上婚，社会资本

Structural Restriction and Individual Trait: Can Upward Marriage

Expand Phoenix Men's Social Capital?

Abstract: Interaction opportunity based on stratification structure and interaction preference based on personal attributes are two factors on constructing social capital. To those whose location changes, will personal attributes still affect their social network? In this paper, we focus on phoenix men to examine whether their upward marriage can expand their social capital. We adopt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to control personal difference between upward marriage group and non-upward marriage group. Regression result reveals these two groups has no difference in expanding their social capital and enhancing the influence of their social network. Although one's location may shift, personal attributes can still affect social capital construction.

Key words: structural restriction, personal attributes,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upward marriage, social capital

1 问题的提出

社会资本是指期望在市场中得到回报的社会关系投资^[1]。作为一种在劳动力市场与日常生活中能够提供优势的资源，何种群体在社会资本的占有方面具备优势是近来的焦点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存在两种解释，分别是基于社会结构的视角和基于个人特质的视角。前者认为人们的交往机会受到阶层结构的制约，而后者认为人们的交往偏好主要源于个人特质。个人的阶层位置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某个群体改变了自身的阶层位置，甚至与高阶层的群体实现阶层融合，那么个人特质在多大程度上依然能够对社会网络建构产生影响？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选择了凤凰男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探讨他们能否通过与城市女性的婚姻来拓展自身的社会网络。由于凤凰男是大众传媒当中的词语，为了在研究当中准确地把握这个词语的含义，我们首先提出凤凰男的操作化定义，凤凰男是指出身农村，通过自身努力在城市工作生活的男性。该群体有两个明显特点：第一，他们与城市人的共同生活，尤其一部分人能够与城市女性联姻，我们将此视为向上婚，实现向上婚的凤凰男在阶层位置上实现了重大突破。基于阶层结构的视角，这是他们扩大自身网络的必要条件，这对应的问题在于突破了阶层结构制约对他们的社会资本建构是否存在帮助？第二，他们长久以来的奋斗历程以及男性的交往偏好，又使他们保持了鲜明的独立精神，这会使得他们在社会资本构建方面存在一定的劣势，进而影响到他们的职业生涯^[2]，虽然婚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减凤

¹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多学科理解的社会网络分析模型研究”（13&ZD177）的阶段性成果。

凰男与城市人的阶层壁垒，获得更多的交往机会，但他们的个人特质在多大程度上仍然会影响他们构建社会资本？

2 城乡二元分割与凤凰男的婚姻

城乡二元分割的结构使得不同出身的青年在社会流动过程中具备了不同的特征，这种特征将会贯穿他们整个奋斗历程。吴晓刚等人的研究显示，由于户籍制度的严格限制，教育成为了农民子女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农民的子女中只有极为优秀的才可能跻身城市，由此形成了一种选择性^[3]：农村居民极为优秀的人和所有城市居民共同居住在城市当中，所以城市居民当中，出身于农村的青年比出身于城市的青年获得更高的经济社会地位，因此父代的教育程度与子代的经济社会地位之间呈现负相关，西方学者观察到的代际之间显著并且强烈的代际继承特征在中国城市并未出现^[4]。

制度性的不平等使得农村出身的孩子在向上流动过程中具有天然的劣势，而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城市梦要比城市居民的子代付出更大的努力。农村基础教育资源薄弱，农民本身又缺乏可供利用的社会资本，所以从一开始他们便缺少可以利用的资源，这样反而培养了利用自身能力的生存惯习。即使到了城市当中，他们之前的惯习依然可能发挥作用。

无论是从凤凰男的出身来看，还是从凤凰男的奋斗历程来看，他们既不具备优势的家庭背景，也相对缺乏获取各种社会资源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凤凰男能够与城市女性实现联姻，既可以视为凤凰男成功实现社会融合，又可以视为凤凰男增加了获取社会资源的途径。凤凰男与城市女性的结合，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二者的个性特征自由选择的，但婚姻生活绝不仅仅是男女两个人的私事，与双方有关系的城市亲友或者农村亲友，都会或多或少地参与到他们的生活当中来^[5]。随着这些亲友而来的，不仅有各自生活方式的调整与对彼此的适应，同时也有乡村与城市两种文化的交锋。但毋庸置疑的是，从宏观上看，凤凰男与城市女性的结合，在很大程度上是城乡融合的体现，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城乡之间的樊篱；从微观上看，对凤凰男个人而言，由于城市女性家庭背景优于自身的家庭背景，这种婚姻为他们弥补自身家庭背景的劣势提供了条件。

既然凤凰男与城市女的结合并非两个人的私事，那么就会有一些外在于夫妻双方的力量在影响着他们的婚姻。在婚姻生活中，夫妻双方与外在力量的关系非但不曾断绝，反而逐渐与这些外在力量形成了非常复杂和宽广的社会联系^[6]。这些外在力量与夫妻双方一起进行互动，并且在日常互动当中逐渐形成了亲密关系。这些外在力量当中的一部分形成了夫妻双方共有的社会资本。这对于出身农村的凤凰男而言是极为重要的：向上婚使得凤凰男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到比自己最初的经济社会地位更高的群体，他们在扩展交往网络、提升社会资本方面可能有更多的机会。因此，基于阶层位置形成的交往机会的视角首先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3 基于阶层结构的交往机会论

人们在日常交往过程中，自身所处的阶层位置有可能影响人们的日常交往机会，而基于阶层位置形成的交往机会能够对人们的社会资本建构产生影响。既往研究首先体现出的就是这样的特征。

林南曾经鲜明地指出，在一个分层的社会当中，阶层地位越高，运作和掌控社会资源的能力也就越大，从而越有可能接触到更好的社会资本^[11]。人们建构自身社会网络，形成自身社会资本的过程，往往就是阶层闭合的一个动态过程^[7]。占据着更高社会地位的人，不仅掌握了规模更大的网络，他们掌握的社会资本在性别、年龄、职业等方面也体现出更强的异质性，形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原因在于阶层结构限制了交往机会，从而不同阶层拥有的社会资本在诸多维度上形成了差异化的特征，“社会资本理论和社会结构的机会与限制理论对于中国

城市居民的社会网络结构特征提供了最好的解释^[8]。

在现实生活当中，社会网络所蕴含的资源往往不是个体所独有的，消费和生活的基本单位往往是以家庭形式出现的，而婚姻在融合夫妻双方的社会资源时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边燕杰和李煜^[9]的研究指出，夫妻出身于不同的家庭，婚姻作为纽带将各自的亲属关系带入共同的生活当中；双方在各自的工作生活场域当中都会形成各自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虽然不会被双方所共有，但是这些关系所提供的社会资源可以被夫妻双方所共享。不同家庭的交往范围、交往层次、可交往的地位高度，都是基于阶层地位变化而变化的。因此，社会资本的形式往往可以反映社会分层的形式^[10]。

这些研究突出了一点，即基于阶层结构的交往机会能够影响人们的社会资本建构。我们可以根据这类研究推论：婚姻可以作为融合夫妻双方社会资本的重要方式，而与更高阶层的配偶生活在一起对自身的社会网络建构将会存在更多的优势。凤凰男可以被视为成功实现向上流动的群体，根据之前的理论推理，本身就比其他出身农村的人占据了更高的阶层位置，而向上婚则使这些人具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到更高阶层的群体。因此，凤凰男的城市生活，尤其是他们的婚姻生活，使他们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到以前在农村难以接触到的人，这为他们扩展自身社会网络提供了可能的条件。

4 基于个体特质的交往偏好论

网络建构不仅仅是与个人所处的阶层位置相关的，更是与个体特征相关的^[11]，具备某种特质的人才会具备某种特质的网络。社会网络的内生性问题在此凸显出来。而这也为社会资本建构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视角：具有某种社会特征的人，往往愿意寻找与自己相似的群体进行社会交往，换句话说，社会网络的形成过程并非一个随机过程，人们寻找交往对象、构建社会网络的过程往往是一个选择性的结果。这与同群效应（peer effect）非常相似。首先我们通过一个例子来体现这种选择性，通过对青少年吸毒群体的研究发现，并不是人们进入某一个群体，受到群体压力之后才会吸毒，而是他们有了进入这一群体的偏好，才会主动进入这一群体，进而有这种不良行为^[12]。通过对青少年同辈群体的行为相似性的研究明确指出，并不是由于青少年聚集在一起之后才变得相似，而是相似的一群人更容易聚集在一起^[13]。McPherson 等人在一篇综述中提到，正是相似性促成了人们之间的联系，在阶层、交往行为等方面具备相似性的群体，在社会网络建构方面也会具备相似的特征，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是网络建构的基本原则^[14]。这些研究说明，个人特质是社会网络的内生变量，具有某种特质的人，总会在社会资本的建构过程中呈现出相似的特征。

就我们的研究而言，凤凰男是能够在城市中工作的一群人，从农村到城市的过程非常艰难，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总要比别人付出更大的努力。这不仅是他们实现向上流动的基础，而且是他们自农村生活开始形成的惯习。在城市生活中，他们更擅长在专业技术岗位从事工作并得到晋升，而这类岗位恰恰是主要通过自身努力才能获得成功的；他们难以在行政岗位得到晋升的原因，恰恰就是被认为缺乏相应的社会资本^[2]。凤凰男的成长之路，从一开始就缺少丰富的社会资本，他们的独立精神贯穿了他们奋斗的始终。他们自身的特点极有可能抑制他们在城市生活当中扩展自己的社会网络，阻碍他们丰富自身的社会资本。

除去凤凰男本身独立奋斗的精神之外，夫妻双方对社会资本的偏好也是存在性别差异的。有研究明确指出，相对于女性而言，男性在选择交往对象时，很难受到结构因素的影响，他们的个体特征更容易影响他们对交往对象的选择^[15]。具体到婚姻生活而言，交往偏好的性别差异十分明显：女性更容易将自己的亲属视为自己社会网络当中的成员^[16]，对于工具性网络，这种特征更明显^[17]。通过对韩国的研究发现，将近一半的男性在结婚之后更倾向于同自己的父母交往，不给配偶的父母提供帮助同时也不从配偶父母那里获取帮助，而这个比例在女性身上只有 1%^[18]。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作为农村出身的凤凰男，似乎并不倾向于

通过配偶的家庭成员来扩大自己在城市当中的网络。国内的研究也可以支持这个判断，虽然关于安徽省的研究显示，婚姻对于男性的社会资本存在影响^[19]，但是基于全国的抽样调查显示，婚姻状况并不会影响农村男性的社会资本^[20]。关于流动人口的研究同样可以体现这一特点，婚姻状况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并没有明显的影响^[21]。凤凰男的向上婚，实际上体现了夫妻双方的地位不匹配（status heterogamy），而社会对这种夫妻双方地位不匹配的态度也不是完全包容的，不匹配的婚姻会降低社会参与、对他人的信任、亲密朋友的数量^[22]。

如果我们根据这些研究推论，凤凰男本身的独立奋斗精神和男性固有的对家庭社会资本的排斥共同构成了他们的个人特质，而个人特质恰恰是形成交往偏好的基础。基于凤凰男自身的独立奋斗精神以及男性的交往偏好，凤凰男的向上婚虽然为他们提供了提升自身社会资本的条件，但是受到他们自身特质的影响，向上婚的凤凰男似乎并不会从婚姻生活当中为自己谋取更多的社会资本。

5 假设的提出

在凤凰男的社会资本建构方面，虽然上述讨论并不能使我们得出一致的结论，但上述两种视角得出的结论都是有可能在现实中发生的，因此我们根据上述讨论提出两组相对的假设。首先，我们遵从阶层位置论，认为阶层的结构位置会影响个人建构和维持自身的网络。而凤凰男的向上婚体现了农村男性与城市女性的结合，实际上是农村男性提高自身阶层地位、冲破阶层结构制约的有效方式。他们既往的网络被限制在亲属网络当中，城市生活使得他们的社会网络在很大程度上被扩展，而扩展的最重要的指标就是非亲属比例的增加。因此我们提出假 1：

向上婚的凤凰男比非向上婚的凤凰男在社会资本方面更具优势。具体地说可以体现在网络规模和网络的影响力两个方面：

凤凰男的根基虽然在农村，但是与城市女性的婚姻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城市居民，而这些人并不是农村居民的亲属。如果他们的向上婚增加了与其他人文交往的机会，那么对凤凰男的社会网络影响最大的就是对非亲属的接触。与配偶亲友的接触，极有可能增加向上婚的凤凰男社会网络中非亲属的比例。因此，我们提出假设 1.1：

相对于非向上婚的凤凰男而言，向上婚的凤凰男其网络中非亲属的比例更高。

向上婚的凤凰男不仅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非亲属，同时也有可能接触到阶层地位更高的群体。婚姻使他们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更多的城市居民，也就是说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构建更有影响力的社会网络。占据社会网络顶端的职业的影响力往往更为重要，因此，我们提出假设 1.2：

相对于非向上婚的凤凰男而言，向上婚的凤凰男的社会网络中，网络顶端的职业声望更高。

但问题在于，根据我们之前的讨论，社会网络的建构不仅受到个体所处的阶层结构的影响，而且可能受到凤凰男的个人特质的影响，即使到城市中生活，他们身上的诸多特质依然可能发挥作用，这也就是个人特质论。如果我们遵从个人特质论，那么凤凰男虽然与城市女性结婚，但是他们并不会倾向于通过家庭成员来扩大他们自身的社会网络。受到他们独立奋斗精神以及男性特有的交往偏好的影响，无论他们是否经历向上婚，在社会网络的拓展方面，尤其是非亲属的拓展方面，都不会占据优势，尤其是在工具性网络建构方面。因此我们提出假设 2：

向上婚的凤凰男与非向上婚的凤凰男相比，在社会网络建构方面不具备明显的优势。

这既体现在他们拓展自身网络上，又体现在他们社会网络的影响力上。我们同样通过非亲属比例来测量他们扩展自身网络的能力，与上一组假设对应，在网络拓展方面我们提出假设 2.1：

无论凤凰男是否经历向上婚，他们拜年网的非亲属比例都不会有显著差异。

同时，他们虽然承认工具性网络对人们工作生活的帮助，但由于他们不会有意通过婚姻这种途径来提高自己社会网络的影响力，因此，婚姻对于凤凰男而言，虽然提供了增加社会资源的必要条件，但凤凰男本身并不倾向于利用这种条件来扩大自身网络的影响力。因此我们提出假设 2.3：

无论凤凰男是否经历向上婚，他们拜年网中的网络顶端的职业声望没有显著差异。

6 数据、变量和方法

6.1 数据和变量

本文使用 CGSS2006 的数据。由于本文涉及到初婚时的配偶双方初婚时的信息，诸如双方的家庭背景，双方的经济社会地位，双方的教育等等。而近年来的 CGSS 数据当中并未涉及初婚时双方个人和家庭背景的详细特征，因此我们选择这套数据来进行分析。

我们所要分析的是婚姻对凤凰男的社会网络建构是否存在影响，而非凤凰男与其他男性相比社会网络是否会存在差异，因此我们只保留数据中所有的凤凰男作为分析样本。我们将凤凰男界定为，出身农村并获得城市户口的男性。我们的分析主要探讨的是婚姻对凤凰男社会资本的影响情况，因此我们不对凤凰男的配偶的特征进行限定。同时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将未婚的样本删除。

本文涉及的因变量主要有两个，分别用来测量凤凰男扩展自身网络的能力以及其网络的影响力。第一，我们使用春节拜年网的非亲属比例来测量凤凰男扩展自身网络的能力。由于有些人春节并未拜访任何人，而我们要计算非亲属的比例，因此我们在每个被访者的春节拜年总人数后面加上 0.1。第二，拜年网当中网络顶端的职业声望，这可以体现凤凰男社会网络的影响力。

凤凰男是否实现向上婚：这是一个虚拟变量，同时也是本文重点探讨的变量。我们通过凤凰男配偶的户籍来测量²。如果凤凰男结婚时其配偶或者配偶的父亲是城市户口，我们认为凤凰男实现了向上婚；如果凤凰男结婚时其配偶或者配偶的父亲是农业户口，我们认为凤凰男没有实现向上婚。

婚姻并不是一个完全随机的过程，往往是个体特征和双方家庭共同形成的结果。因此，本文首先会涉及到双方结婚时的家庭背景和个人特征：

结婚时凤凰男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Socio-economic Index: SEI)：这可以代表凤凰男结婚时的家庭背景。

结婚时凤凰男配偶父亲的 SEI：婚姻往往是两个家庭的事情，因此在控制了凤凰男父亲的家庭背景之后，也要控制凤凰男配偶父亲的家庭背景。

结婚时凤凰男的 SEI：通过凤凰男结婚时的社会经济地位来代表他们结婚时的个人特征。

结婚时凤凰男配偶的 SEI：在控制了凤凰男的社会经济地位之后，同样要控制凤凰男配偶的社会经济地位。

结婚时凤凰男的教育年限，结婚时凤凰男配偶的教育年限。夫妻双方在结婚前的教育年限作为重要的个人特质，是婚姻选择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因此需要控制夫妻双方的教育

² 婚姻匹配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很难通过一个指标完全表现出来。对凤凰男而言，城乡分割是最重要的一一个因素，因此本文只呈现了通过这一个指标衡量的向上婚。除了户籍因素之外，我们还考虑了结婚时夫妻双方父亲的经济社会地位指数（如果女性父亲的经济社会地位指数高于男性则被视为向上婚）、结婚时双方对配偶家庭背景的评价（被访者认为女性家庭背景好于自己的家庭背景则视为向上婚）来衡量凤凰男是否实现了向上婚。通过这些指标衡量向上婚，最终的统计结果与本文呈现的一致，篇幅所限，未能呈现，如有需要欢迎与作者联系。

程度。

由于一个人的社会网络极有可能收到其经济社会地位的影响，因此还需要控制凤凰男现在的 SEI。另外，由于婚姻匹配可以体现社会的开放程度^[23]，而我国不同区域的社会开放程度有所差异，因此我们将区域作为一个控制变量。

凤凰男现在的 SEI：由于社会资本有可能受到职业本身的影响，因此我们也将男性现在的经济社会地位作为控制变量。

凤凰男的年龄：由于年龄可以体现时代的变迁，而婚姻匹配在不同时代的表现有所不同，为了控制时代所造成的差异，我们将凤凰男的年龄作为控制变量。下表是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 1：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类型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非亲属比例	定距变量	0.75	0.30	633
网络顶端	定距变量	44.16	37.85	633
凤凰男是否向上婚	二分变量	0.25	0.44	633
男性结婚时的 SEI	定距变量	36.08	14.62	599
女性结婚时的 SEI	定距变量	28.93	11.24	539
男性结婚时其父亲的 SEI	定距变量	27.81	11.19	606
女性结婚时其父亲的 SEI	定距变量	26.07	10.17	600
男性结婚时的教育	定距变量	8.85	3.30	633
女性结婚时的教育	定距变量	4.02	3.81	600
是否在东部	二分变量	0.40	0.49	633
男性现在的 SEI	定距变量	39.83	13.84	626
男性现在的年龄	定距变量	45.88	13.01	631

6.2 方法

我们使用的是—套观测数据（observational data），观测数据在干预变量的分布上往往不是随机的。而因果分析希望得到的结果恰恰是干预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是否有效，由于观测数据并不能保证所有的自变量在干预变量的分布上面都是随机的，所以由此估计出来的干预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可能是有偏的。结合我们的研究而言，我们将“是否向上婚”视为一个干预变量，现实生活中，婚姻匹配并不是一个完全随机的过程，结婚时双方的家庭背景和个体特征都有可能影响到婚姻匹配的结果。因此首先要对每一个自变量和干预变量进行二元分析，由此来判断结婚时双方的家庭背景和个体特征在“是否向上婚”这个干预变量的分布上面是否是随机的。我们将每一个自变量与是否向上婚进行 t 检验或者卡方检验，如果检验结果是显著的，说明这个自变量在是否向上婚上的分布不是随机的（详见表 2）。我们要采用倾向值匹配，对样本进行“再抽样”^[25]，使得向上婚与非向上婚的凤凰男在若干社会特征上是一致的，从而保证统计结果的因果性。需要说明的是，在表格当中并没有涉及男性现在的 SEI，因为从时间的先后性来考虑，男性现在的 SEI 不会影响他们的婚姻匹配，而我们在此仅需要考虑那些可能影响婚姻匹配的变量。在表格当中，我们对区域和是否向上婚进行卡方检验，对其他变量和是否向上婚进行 t 检验。

表 2：匹配前的双变量检验

变量	未实现向上婚的均值 (括号内为样本量)	实现向上婚的均值 (括号内为样本量)	t 检验或者卡方检验的 p 值
男性结婚时的 SEI	34.61 (444)	40.27 (155)	0.0000

女性结婚时的 SEI	28.31 (412)	30.96 (127)	0.0198
男性结婚时其父亲的 SEI	24.67 (454)	37.16 (152)	0.0000
女性结婚时其父亲的 SEI	24.62 (445)	30.23 (155)	0.0000
男性结婚时的教育	8.61 (469)	9.55 (164)	0.0016
女性结婚时的教育	3.72 (444)	4.90 (156)	0.0008
年龄	46.06 (469)	45.37 (164)	0.5628
区域			
东部	79.92% (203)	20.08% (51)	0.006
中西部	70.18% (266)	29.82% (113)	

我们具体采用的方式是贪婪匹配 (greedy matching) 对样本进行再抽样，由于这种匹配方式会损失样本，因此我们采用四种不同的方法对样本进行再抽样，保证结果的稳健性。通过四种匹配方式之后，我们对每个自变量和是否向上婚进行了二元分析，结果如下：

表3：采用四种匹配之后的二元分析

变量	卡尺距离为 0.25 个标准差的最近 距离匹配	卡尺距离为 0.1 的最近距 离匹配	没有倾向值的马 氏距离法	有倾向值的马 氏距离法
男性结婚时的 SEI	0.0202	0.0610	0.6562	0.3848
女性结婚时的 SEI	0.6632	0.2742	0.7275	0.6406
男性结婚时其父亲 的 SEI	0.4527	0.1813	0.1065	0.0670
女性结婚时其父亲 的 SEI	0.9053	0.6816	0.2478	0.3070
男性结婚时的教育	0.5349	0.8878	0.7112	0.8418
女性结婚时的教育	0.4625	0.3386	0.7705	0.7282
年龄	0.7789	0.7270	0.7921	0.7189
区域	0.210	0.249	0.862	0.862
样本量	140	124	144	144

注：表格中数字为 t 检验或者卡方检验的 p 值

经过倾向值匹配，我们对向上婚和若干可能影响向上婚的变量进行了二元分析，发现这些变量对向上婚的影响都变得不显著了，也就是说这些变量在向上婚与非向上婚的分布上是一致的：对于向上婚和非向上婚的凤凰男而言，这两组人在表格中所列变量的取值是相似的，这两组人的区别仅在于是否向上婚。由此我们才能保证回归模型体现的统计关系是因果关系。由于因变量是定距变量，因此我们使用一般线性回归来估计各个变量的效应进行估计。由于我们对原来的样本进行了四次匹配，因此我们在回归分析当中也把基于这四个样本的回归结果都呈现出来。

7 统计结果

表 4: 凤凰男的交往范围拓展模型

	卡尺距离为0.25 个标准差的最近 距离匹配	卡尺距离为0.1个 标准差的最近距 离匹配	没有倾向值的马 氏距离法	有倾向值的马氏 距离法
是否向上婚	-0.02 (-0.56)	-0.01 (-0.29)	0.02 (0.54)	0.001 (0.04)
结婚时凤凰 男的SEI	-0.003* (-2.21)	-0.003 (-1.96)	-0.003* (-2.09)	-0.003* (-2.11)
结婚时配偶 的SEI	-0.001 (-0.98)	-0.0003 (-0.19)	-0.001 (-0.58)	-0.001 (-0.42)
结婚时凤凰 男父亲的SEI	-0.001 (-1.07)	-0.001 (-1.20)	-0.002 (-1.34)	-0.001 (-1.17)
结婚时配偶 父亲的SEI	-0.0007 (-0.59)	-0.00005 (-0.03)	-0.00006 (-0.05)	-0.0002 (-0.13)
结婚时凤凰 男的教育	0.003 (0.51)	-0.0009 (-0.14)	0.0001 (0.02)	0.003 (0.46)
结婚时配偶 的教育	-0.003 (-0.56)	0.003 (0.53)	0.009 (1.97)	0.007 (1.46)
区域（中西部 为参照项）	0.007 (0.21)	0.008 (0.22)	-0.004 (-0.11)	-0.01 (-0.37)
凤凰男现在 的SEI	0.001 (0.92)	0.001 (0.87)	0.002 (1.18)	0.001 (0.78)
男性现在的 年龄	-0.00007 (-0.05)	-0.002 (-1.15)	-0.0001 (-0.08)	-0.0007 (-0.49)

常数项	0.30 [*] (2.57)	0.32 ^{**} (2.67)	0.20 (1.76)	0.25 [*] (2.15)
N	140	126	144	144
R ²	0.07	0.07	0.07	0.06

注：括号内为 t 值；*: p<0.05, **: p<0.01, ***: p<0.001。

首先我们对凤凰男能否通过向上婚拓展自己的网络规模进行验证。根据上述四种匹配方式抽取了四个样本，然后分别对这四种方式抽取到的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发现我们关注的向上婚并不能使得凤凰男扩展自己的非亲属比例。换句话说，我们的数据发现，凤凰男能够和城市女性结为夫妻，这确实为凤凰男扩展自己交往范围提供了潜在的优势，但是与城市女性结为夫妻并没有为凤凰男扩展自己的社会网络带来实际效果。除去我们重点关注的向上婚这个变量之外，凤凰男结婚时的经济社会地位降低了凤凰男网络中的非亲属比例。我们使用了不同的匹配方法得到了基本一致的结果，说明这一结果是比较稳健的。接下来我们对凤凰男能否通过向上婚提高自己网络的影响力进行建模。

表 5：凤凰男的网络影响力增加模型

	卡尺距离为0.25 个标准差的最 近距离匹配	卡尺距离为0.1 个标准差的最 近距离匹配	没有倾向值的 马氏距离法	有倾向值的马 氏距离法
是否向上婚	4.58 (0.74)	0.24 (0.03)	4.62 (0.73)	2.84 (0.45)
结婚时凤凰男的 SEI	-0.26 (-1.00)	-0.06 (-0.18)	-0.09 (-0.34)	-0.004 (-0.02)
结婚时配偶的SEI	0.58 [*] (2.22)	0.57 (1.87)	0.42 (1.51)	0.41 (1.48)
结婚时凤凰男父 亲的SEI	0.25 (0.95)	0.20 (0.77)	0.17 (0.65)	0.27 (1.08)
结婚时配偶父亲 的SEI	0.17 (0.70)	-0.067 (-0.25)	0.13 (0.56)	0.13 (0.55)
结婚时凤凰男的 教育	0.47 (0.44)	0.2072 (0.16)	-0.5670 (-0.47)	-0.55 (-0.46)
结婚时配偶的教 育	0.70 (0.77)	0.24 (0.23)	1.39 (1.48)	1.04 (1.15)

区域(中西部为参考项)	-0.34 (-0.05)	-3.80 (-0.51)	-0.73 (-0.11)	-1.77 (-0.26)
凤凰男现在的SEI	0.78** (2.94)	0.54 (1.63)	0.78** (2.71)	0.65* (2.32)
凤凰男现在的年龄	0.63* (2.26)	0.38 (1.16)	0.71* (2.50)	0.70* (2.47)
常数项	-39.30 (-1.71)	-11.88 (-0.46)	-39.24 (-1.69)	-36.93 (-1.62)
N	140	126	144	144
R ²	0.16	0.15	0.13	0.13

注：括号内为 t 值； *: p<0.05, **: p<0.01, ***: p<0.001。

从表 5 可以看出，向上婚对增加凤凰男的网络顶端的职业声望并没有影响。我们通过四种匹配方式得到的样本都可以体现这一点。这个结果说明，向上婚虽然让农村出身的男性有了更多接触城市居民的机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凤凰男会利用婚姻作为增加自己社会资本的手段和方式，凤凰男的向上婚并未增加他们社会网络的影响力。虽然他们跻身城市，并且与城市女性结为连理，但这至多只是他们增加自己社会网络影响力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对这种结果的解读，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凤凰男的自身特征，他们并没有将向上婚作为自己扩大社会网络影响力的途径。虽然这并不代表凤凰男不会扩大自身的社会网络，但是他们似乎不愿意通过家庭这个途径来扩大自身的社会网络。除去我们重点关注的向上婚之外，其他的控制变量对凤凰男社会网络顶端的职业声望影响基本都不显著。为了证明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同样采用四种匹配结果来进行回归分析，四个模型显示出基本相同的结果。

同样需要说明的是，在两个模型当中，除了向上婚这个变量之外，其他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大多不显著，无论是对凤凰男的非亲属比例还是对它们网络顶端的影响。这并非我们模型或者变量选择存在问题，而是由于倾向值匹配本身的目的就是为了平衡若干控制变量，降低样本在这些变量上的差异。我们通过匹配进行“再抽样”，使得若干控制变量在是否向上婚的两个取值上面都是平衡的。这种平衡能够保证除了我们重点关注的干预变量之外，“其他条件都是一致的”，从而保证我们探讨的这种关系的因果性。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无论凤凰男是否向上婚，在若干控制变量上的特征都是一致的，这些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也极有可能不显著。

8 结论与讨论

我们通过倾向值匹配控制了向上婚与非向上婚的凤凰男在诸多特征上的差异，使得向上婚与非向上婚的凤凰男在诸多社会特征上是相似的，然后我们探讨凤凰男的向上婚对其社会网络建构的影响才具有因果的含义。统计结果显示，凤凰男并没有将婚姻作为扩展他们社会网络的途径。这首先可以回应人们对凤凰男向上婚目的的质疑，他们并不是为了结识更高地位的人，从这个角度上看，他们并不倾向于将婚姻赋予更多的工具性含义，婚姻并不是凤凰男获取社会资本的有效方式。这不仅是对现实中凤凰男被污名化^[25]的回应，而且具有更深层次的理论含义。

回到我们最开始提出的理论问题。如果社会网络建构是内生于个人特征的，那么阶层位

置对社会网络建构的影响很可能受到削弱，我们的数据也支持了这一观点。凤凰男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其阶层背景上的劣势，但与此同时男性的交往偏好与独立奋斗的精神依然贯穿在他们的婚姻生活当中。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与城市女性结婚，这增加了这部分人在阶层位置上的优势。虽然向上婚使凤凰男占据了相对更高的阶层优势，但这种优势并不能为他们扩大自身的社会网络提供有效的帮助。凤凰男在构建自身网络过程中，仍然受到了其早年奋斗经历的影响，独立的奋斗精神并没有使他们刻意将家庭成员纳入到自己的网络当中来；同时，在社会资本建构方面，男性本身的交往偏好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凤凰男的网络建构的。所以，仅就我们研究的群体而言，在他们的社会资本建构方面，阶层位置发生变化并与更高阶层的群体发生融合虽然给他们提供了更多的交往机会，但是这并没有给他们建构自身社会网络带来明显的优势，基于个人特质的交往偏好远比基于阶层结构形成的交往机会的影响更为深远。

参考文献

- [1] 林南. 社会资本[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18, 63.
- [2] 林易. “凤凰男”能飞多高[J]. 社会. 2010, (1):88-108
- [3] Wu, X. & Treiman D.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1955-1996[J]. *Demography*. 2004(2): 363-384
- [4] 吴晓刚. 中国的户籍制度与代际职业流动[J]. 社会学研究. 2007, (6) :38-65
- [5] 张学东. 对“凤凰男”与“孔雀女”婚姻问题的社会学分析[J]. 中国青年研究. 2009, (4) :13-16
- [6] 费孝通.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131
- [7] 张文宏, 李沛良, 阮丹青. 城市居民社会网络的阶层构成[J].社会学研究. 2004, (6) :1-10
- [8] 张文宏. 城市居民社会网络资本的阶层差异[J]. 社会学研究. 2005,(4): 64-81
- [9] 边燕杰, 李煜. 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J]. 清华社会学评论. 2001, (2): 1-18
- [10] Pichler, F. & Wallace, C. Social Capital and Social Class in Europe: The Role of Social Networks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J].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9, (3): 319-331
- [11] Mouw, T. Social Capital and Finding a Job: Do Contacts Matter?[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3, (6): 868-898
- [12] Coggans, N. & McKellar, S. Drug Use Amongst Peers: peer pressure or peer preference? [J]. *Drugs Education Prevention & Policy* 1994, (1) : 15-26
- [13] Kandel, D. B. Homophil, Selection, and Socialization in Adolescent Friendship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8, (2) : 427-436
- [14] McPherson, M., Smith-Lovin, L. & Cook, J. M. 2001, Birds of a Feather: Homophily in Social Networks[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1, (27) : 415-444
- [15] Kalmijn, M. Sex Segregation of Friendship Networks: Individual and Structural Determinants of Having Cross-Sex Friends[J].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2, (1) :101-117
- [16] Rogler, L. H. & Procidano, M. E. The Effect of Social Networks on Marital Roles: A Test of the Bott Hypothesis in an Intergenerational Context[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1986,(4) : 693-701
- [17] Webster, S. W., Benson, D. E. & Spray, S. L. Gender, Marital Status and Social Support[J]. *Sociological Focus*. 1994, (2) : 131-146
- [18] Schloemer, G. L. & Fosco, G. M., Cleveland, H. H., Vandenberghe, D. J. & Feinberg, M. E. Interparental Relationship Sensitivity Leads to Adolescent Internalizing Problems: Different Genotypes, Different Pathways[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15, (2) : 329-343
- [19] 李艳, 李树苗, 韦艳, 蒋丹妮. 农村男性的婚姻状况与社会支持网络[J]. 西安交通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3): 54-62

- [20] 吴彩霞, 李艳, 靳小怡.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社会资本研究——基于借贷网络的视角[J]. 人口与经济. 2012, (1) :71-77
- [21] 任远, 陶力. 本地化的社会资本与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J]. 人口研究. 2012, (5): 47-57
- [22] 张小天. 张小天文集[M].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 199.
- [23] 李煜. 婚姻匹配的变迁：社会开放性的视角[J]. 社会学研究. 2011,(4) :122-136
- [24] 郭申阳, 马克·W.弗雷泽. 倾向值分析：统计方法与应用[M].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2: 84.
- [25] 王文龙. 社会学视野下凤凰男的污名化现象研究[J]. 中国青年研究. 2014, (11): 73-79